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六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六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
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 6 / 钱穆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09. 12
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3218-8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国—文集
IV. B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5439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装帧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图 字 01-2008-3069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
字 数 169 千字
印 数 0,001—4,000 册
定 价 22.80 元

序

自余成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即有意续撰《研朱余沈》，即《朱学流衍考》，起自元初黄东发，迄于清末，历元明清三代，共得几二十人。后又决意汇此论丛，遂并《研朱余沈》纳入，不另成书，以便观省。此册共收黄东发、王深宁、吴草庐三家，可见元初学术思想之大概。又一九五二年在台北伤脑部，养病于台中市，读杂部明人笔记，乃知明初诸人，皆不忘元廷，无意出仕。越数年，在香港成《读明初开国诸臣集》。及迁居台北，又续成《读杨维桢〈东维子集〉》以下各篇，可见元末学术思想之大概。有元一代，大率尽此。又加旧作《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》一篇及来台后所讲《理学与艺术》一篇，共成此册。最近病目，不能识字，此册付印，则不复再自亲校，因亦无所改定。

一九七八年七月钱穆自识于外双溪之

素书楼，时年八十有四。

目 录

序 1

黄东发学述 1

王深宁学述 35

吴草庐学述 61

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 86

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 188

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 219

理学与艺术 232

黄东发学述

少时读顾亭林《日知录》，即知黄震东发其人而好之。及读全谢山《宋元学案》称引黄氏语益多，益增想慕。然其书《日钞》颇难得。中岁游北平，始获一部，方别有撰述，未暇细加籀诵。年来草为《朱子新学案》，称引黄氏语亦仅据谢山。及《学案》成书，始抽暇通体玩诵《日钞》，复稍摭其一二条增入《学案》。窃谓后儒治朱学，能深得朱子奥旨者，殆莫逾于黄氏。爰草斯篇，以见梗概，并以补谢山所未及。

谓黄氏深得朱学奥旨者，在其学博而能醇。《日钞》分类百卷，今行者九十七卷。经类三十一卷。诸儒书两宋二十家共十三卷。诸子类自《家语》孔氏书以下凡五十一家五卷。史类自《史记》下迄两宋，正杂史凡十五种九卷。文集韩柳欧苏曾王涪翁浮溪石湖水心共十家十卷。合共六十八卷。可见其生平读书治学之广大。其外二十九卷则为其文集。

东发以一理学大儒，观其《日钞》，经史子集罔不搜罗，可谓繁夥矣，然独无语录，此为理学家一异。其研精文史，用力之勤，

可谓理学家中之又一异。盖东发之学,专崇朱子,其学博,即承朱子之教而来。然于朱子成说亦时有纠正,不妮妮姝姝务墨守,此则尤值重视。朱子论学极尊二程,亦时于二程有纠正。东发之能纠正朱子,乃正见其善学也。

《日钞》引黄勉斋书,朱先生一部《论语》,直解到死。东发亦自言,终身读《论语》,古今一晦庵。《日钞·读论语》只一卷,着墨无多,而曰余则尽在《集注》矣。此其崇奉朱子《集注》之意可见。然此一卷中,即多纠正语。如有子孝弟章,《日钞》曰:

《论语》首章言学,次章即言孝弟,圣门之教人,莫切于孝弟矣。此章象山斥其为支离。程子言,为仁以孝弟为本,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。性中只有仁义礼智,曷尝有孝弟来。其说性尤精。实则孟子之道天性,而其说微觉求多于本文之外。晦庵或问中云:孝弟则固仁之发而最亲者,此语为婉而切,似当收置《集注》,使学者知孝即仁之事,而仁即性之有可也。

又曰:

孔子说仁,又多与智对说。至孟子方说仁义礼智四者。程子谓曷尝有孝弟,盖以孟子之说释有子之说尔。有子时,未有四者之说,亦未专主于说性。孝为仁之本,理脉固自浑融。且孟子虽分仁义礼智为四端,他日又尝说仁之实事亲是也。圣贤立论,惟理是务,亦未尝拘一端。其言仁义,亦未尝

不根于孝弟。故孔子尝曰：夫言岂一端而已，夫各有所当也。

程氏言性中那有孝弟来，朱子亦谓其是一险语，然朱子注此章，实未能摆脱程氏语之缠缚。东发引朱子他处语，惜其未收置《集注》中，实是本朱语纠程氏。而谓程氏乃以孟子说释有子，又别引孟子说以见程说之无当。辨析精确，是诚深有得于朱子之读书法者。厥后至于晚明，程氏性中曷尝有孝弟来一语，备受诟病。惜乎朱子未能矫正在前，而东发则固已纠之矣。至其不取象山说，则可无待深论。

又曾子三省章，《日钞》曰：

《集注》首载尹氏曰：曾子守约，故动必求诸身，语意已足。次载谢氏曰：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，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。独曾子之学，专用心于内，惜其嘉言善行不尽传。窃意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。用心于内，近世禅学之说耳。后有象山，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，其学不传。诸子是外面入去，今传于世，皆外入之学，非孔子之真。遂于《论语》之外，自称得不传之学，凡皆源于谢氏之说。使晦庵《集注》于今日，谢氏之说不知亦收载否。

东发谓孔门无专用心于内之学，其说亦本朱子。朱子又谓自谢上蔡一转而为张无垢，再转而为陆象山。然《集注》此章，终自并收尹谢两家之说，东发加以纠弹，可谓的切之至。

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，《日钞》曰：

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,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,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,遗落世事,指为道妙。甚至谢上蔡,以曾皙想像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,云三子为曾皙独对春风冷眼看破。但欲推之使高,而不知陷于谈禅,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。程子曰:孔子与点,盖与圣人之志同,便是尧舜气象。此语微过于形容,上蔡因之而遂失也。

又曰:

老安少怀之志,天覆地载之心也,适人之适者也。浴沂咏归之乐,吟风弄月之趣也,自适其适者也。曾皙固未得与尧舜比,岂得与夫子比。而形容之过如此,不合于其分量而审之矣。

《论语》与点一叹,程子识其与圣人之志同,便是尧舜气象。《集注》为程氏此番话束缚;虽前后屡变其说,而终未能痛快打破程氏之樊笼。后惟东发为能指出《论语》此章本旨,而咎程氏形容之过。然循此以下,直迄晚明,与点一叹,终自为理学家所乐道,而又张皇之不已。明道曾点尧舜气象之意,乃与宋明理学相始终,是诚大可詫惜也。

又性相近章,《日钞》曰:

性者,人得之于天以生者也。其性之所自来,固无有不善。而既属于人,则不能以尽同。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

相近也。至孟子,当人欲横流之时,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晓当世,故专以性善为说。由今观之,谓性为相近,则验之身,稽之人,参之往古,考之当今,上采之圣贤,下察之庶众,无一不合,信乎其为相近也。谓性为皆善,则自己而人,自古而今,自圣贤而众庶,皆不能不少殊。言性之说至本朝而精,以善者为天地之性,以不能尽善者为气质之性,此说既出,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说。世之学者,乃因此阴陋吾夫子之说而不敢明言其为非,则曰性相近是指气质而言,若曲为之回护者。然则孟子之言性何其精,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。窃意天命之谓性,所谓天地之性,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,推性之所从来也。所谓气质之性,是指既属诸人而言也,斯其谓之性者也。夫子之言性,亦指此而已耳。本朝之言性,特因孟子性善之说,揆之人而不能尽合,故推测其已上者,以完其义耳。言性岂有加于夫子之一语哉。夫子言性相近,他日言中人以上,中人以下,生而知,学而知,人品节节不同,皆与相近之言无戾。孟子专言性善,他日言二之中,四之下,性之及之,先觉后觉,人品亦各各不同,终归于夫子相近之说。夫子未尝言性,言性只此一语,何今世学者言性之多也。

又曰:

孟子言忍性,是性不能皆善,而忍亦习之义也。

判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,亦宋明理学家一大事。陆王学者少言性,程朱学者则鲜不言性,而所辨,实亦无逃于如东发所指陈。惜乎此风扇荡,终难骤返。直至晚明,顾亭林始力言《论语》不言性与天命,而陆桴亭著《思辨录》,其论性大旨,乃一如东发,引孔子性相近之语以上驾乎孟子道性善之上。东发亭林桴亭三人,皆善学朱子。朱子本人翻此窠臼未尽,至三人始逐步翻出,可见学术风气变之有渐而不易。而欲寻求朱子学之流衍,则必于此三人者,乃可得其真血脉真传统所在。此难确指,贵于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窥而见也。

又读《尚书·舜典》人心惟危一章,《日钞》曰:

近世喜言心学,舍此章全章本旨,而独论人心道心。甚者单摭道心二字,而直谓即心是道。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。蔡九峰作《书传》,尝述朱文公之言曰:古之圣人,将以天下与人,未尝不以治之之法而并传之,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。其后进此《书传》于朝者,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。世之学者,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,而禅学者借以为据。愚案:心不待传也。流行天地间,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。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。心者,所以统宗此理,而别白其是非。人之贤否,事之得失,天下之治乱,皆于此乎判。禅学以理为障,而独指其心,曰:不立文字,单传心印。此盖不欲言理,为此遁辞,付之不可究诘云耳。圣贤之学,由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,无非至理之流行,明白洞达,人人所同。历千载,越宇宙,有不期而

同，何传之云。俗说浸淫，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，故僭书其所见如此。

传心之说，朱子已先二陆鹅湖寺诗言之。东发一意尊朱，《文集》斑斑可考，东发宁有不知。惟蔡沈《书集传序》单拈心学以为发挥，实失师门宗旨。而所谓《虞书》十六字传心诀者，乃直至晚明，犹噪传不辍，贻害学术界非浅鲜。东发之辨，不仅以辨陆王，亦所以辨程朱，可谓卓绝而特出，惜乎了此义者之终鲜其人也。

朱子《诗集传》不采《诗序》，《日钞》论之曰：

《诗》非《序》，莫知其所自作。去之千载之下，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，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，诚亦难事。然其指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为郑卫之音，则其辞晓然，诸儒安得回护而谓之雅音。若谓《甫田》《大田》诸篇皆非刺诗，自今读之，皆蔼然治世之音。若谓成王不敢康之，成王为周成王，则其说实出于《国语》，亦文义之晓然者。其余改易固不可一一尽知，若其发理之精到，措辞之简洁，读之使人了然，亦孰有加于晦庵之《诗传》者。学者当以晦庵《诗传》为主，间有于意未能遽晓者，则以诸家参之，庶乎得之矣。

此论可悬为后人治《诗》一方针。惜乎清儒不胜其门户之私见，必欲尽返之于毛传郑笺以为快。猎奇钩异者，复旁搜于齐鲁韩三家，使《诗》学重困于丛榛宿莽中，不能复出，亦可慨也。

朱子治《易》，兼取伊川康节，东发则深以为不然。《日钞》曰：

我朝理学大明，伊川程先生始作《易传》，时则有若康节邵先生，又别求《易》于辞之外。晦庵朱先生作《易本义》《易启蒙》，乃兼二说。愚按：《易》诚为卜筮而作，考之经传无有不合。《易》至晦庵，信乎其复旧而明且备也。康节所谓先天之说，则《易》之书本无有。《易》于理与数，固无所不包。伊川言理，而理者人心之所同。康节言数，而数者康节之所独。明理者虽不知数，自能避凶而从吉。学数者傥不明理，必至舍人而言天。伊川之言理，本之文王孔子。康节之言数，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。穷理而精，则可修己治人，有补当世。言数而精，不过寻流逐末，流为技术。康节大儒，以《易》言数，虽超出汉人之上，然学者亦未易躐等。若以《易》言理，则日用常行，无往非《易》，此宜审所当务也。

东发不阿守朱子一家言，观此处更可见。

《日钞》又言之，曰：

谓《易》本卜筮，谓《诗》非美刺，谓《春秋》初不以字为褒贬，皆旷世未闻之高论，而实皆追复古始之正说。乍见骇然，熟辄心靡。卓识雄辨，万古莫俦。

其推崇朱子，洵可谓更莫有加矣。抑其融会义理考据而一视之，

绝不存芥蒂于胸中，此层更值重视。若使此下学术界，能沿此蹊径，续此轨辙，则何来有汉宋之门户。

东发治学，既一本朱子，其于群经大义，几乎一依朱子为从违。偶有矫挽，皆其荦荦大者，已略引如上。故《日钞》于读《论》《孟》《诗》《书》《周易》，皆各得一卷，因朱子皆有成书，不烦多立论也。《日钞·读春秋》凡七卷，《读戴礼》凡十六卷，论议较多，则因朱子于此，未有成书，并亦较少阐说也。

《日钞》于读本朝诸儒理学书，朱子外极推濂溪，谓：

本朝理学，阐幽于周子，集成于晦翁。太极之图，易通之书，微晦翁，万世莫能明也。肃襟庄诵之为快，何啻蝉蜕尘滓而鹏运青冥哉。

然其论寻孔颜乐处一节乃曰：

颜子之乐，周子于《通书》固尝言之，曰：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。大者，性命之源，道德之至尊至贵，小则所谓芥视轩冕，尘视金玉者也。夫然，故吟风弄月，自然不胜其乐。不见大国足民，小国为相，区区必于有行之滞累耳。周程之相与领会，其大若此，而其剖示于《通书》者，又显著若此。后世有能笃信而自得之，其乐岂有异乎哉。若其极论天地所安之处，以至于六合之外，则周子高明而博学，穷极造化，自然造诣，学者未宜过而问也。颜子所乐之处，实吾心固有。天地所安之处，于人事无关。

此辨义旨深微。寻孔颜乐处,乃是濂溪传授二程理学大血脉所在,顾后来程谢特提曾点,则显与濂溪所举孔颜乐处道路有歧,此一也。濂溪为学,穷极造化,曾与二程极论天地所安,二程于此方面不多传述,微朱子,则太极一图之精奥闳深,将使后世莫能明,然所谓孔颜乐处则殊不在此。《日钞》援据《通书》,加以发明,此二也。至于造化阴阳,东发似少详究。象山贻书朱子,极论《太极图》,东发是朱非陆,如此而止。论性则宁从《论语》、论《易》则颇不喜康节,其读《朱子语类》,则曰:

读《朱子语类》,如仰观造化之大,莫知所措辞。然尝详之,夫子作六经,后来者溺于诂训,未害也。濂洛言道学,后来者借以谈禅,则其害深矣。此无他,凡近者犹可进而至于高明,一流于高空,则恐无复可返之期,误人未央也。今朱子解剥濂溪之图象,哀列二程之遗书,以明道学之正传者如此。穷极释氏之作用是性,辨诂诸老之流入禅学,以明其徒之似是而非者如彼。使道学之源不差,而夫子之道复明,此其有功于天下万世,较之施于用世者,拨乱反正,岂足喻劳烈之万一哉。

此乃东发自己学术立场所在,切近人事,不落高空,凡读《日钞》,胥当注意此一分辨也。

东发讨论北宋理学诸儒,尤所辨析入细者,乃在分别指出二程与朱子之有相歧处,此层从来未经注意,加以剖说。夫谓朱子学本二程,此固无可疑者。然若谓朱子于传述二程外更无建树,

则何贵于程门诸大弟子外,更多生一朱子。抑且朱学即程学,朱子仅是程门一传人,则述朱即所以述程,阐程不烦复阐朱。朱子在宋代理学中之地位,究如何乎。后人称述理学,必程朱骈举,又必朱陆对立。然朱子年事学历,先于二陆。鹅湖之会,已在朱子成学之后。朱子不为反陆而有学也。故仅以朱陆异同一观点衡量朱子,则决不足以包举朱子为学之大全。而且二陆之学,虽曰自成于门庭之内,兄弟之间,然岂绝无所闻见濡染于时贤,而果谓其崛然拔起于孟子以后千五百年群所不传而己有独得之秘乎。二陆之学亦时复有得于程门,惟象山喜明道不喜伊川,然岂明道伊川伯仲之间,亦犹如象山与晦庵之相水火乎?若谓象山亦上承明道,则又当置朱子于何地?惜乎后之治理学者,必曰程朱陆王,而治经学者,又必分汉学宋学,惟求门户之明显,不贵道术之会通,既为风气所限,亦是识解有蔽,故相率陷此樊囿,莫能脱出。惟东发于此,乃益见其卓犖之孤识,为前后诸儒所莫逮也。

《日钞》有曰:

自孔孟殁,异端纷扰者千四百年。中间惟董仲舒正谊明道二语,与韩文公《原道》一篇,为得议论之正。迨二程得周子之传,然后有以穷极性命之根柢,发挥义理之精微。议者谓比汉唐诸儒说得向上一层。愚谓岂特视汉唐为然。风气日开,议论日精,濂溪之言,虽孔孟亦所未发。特推其旨,要不越于孔孟云耳。然孔子于性理,举其端而不尽言,或言之,必要之践履之实,固可垂万世而无弊。自心性天等

说，一详于孟子，至濂溪穷思力索，极而至性以上不可说处，其意固将指义理之所从来，以归诸讲学之实用。适不幸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虽所出异源，而同湍激之冲。故二程甫没，门人高弟多陷溺焉。不有晦翁，孰与救止。呜呼危哉。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，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。

后人言朱学，率多注重于其辨象山，少能注重及其所加于程门之挽救。东发此条，言婉而切，语简而挚，苟非深入两宋理学阃奥，能真有得于朱子论学之渊旨者，则鲜能道及于此。

《日钞》又曰：

程氏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，微言奥旨，特散见于门人之集录，赖朱子起而搜逸访遗，始克成编。其尤切于日用者，已类而为《近思录》。然朱子必丁宁学者，更求之全书。及考其所编之全书，乃称伊川自谓，惟李籲得其意，故以为首篇。且反复详论，谓失之毫厘，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。然则学者之读遗书全编，其又可不懂乎。

此处即本朱子意，谓读《二程遗书》不可以不谨。此下遂历举《遗书》多条，而曰：

大抵孔孟之学，大中至正之极。而二程之学，正以发明孔孟之言。不幸世之黠者，借佛氏之名，售庄列之说，荡以高虚，举世生长习熟于其间而不自知。闻程子之说，稍不加